

## 楚雄彝文典籍

楚雄州现今尚存彝文典籍（包括彝文碑刻）。著名的禄劝镌字岩彝文石刻，便是由武定罗婺部土官知府凤英，在明弘治十三年（1500年）奉命征梁王山归来后，“偕宾佐泛舟掌鸠河、勒功石壁”时所刻的罗婺凤氏彝文族谱。于2008年入选首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的彝文古籍《尼苏》一书，则系明嘉靖十六年（1537年）的抄本，该书的6枚收藏印章中，有一枚铭文为“继祖之印”，是明代嘉靖末年（1566年）罗婺部凤氏土酋的风继祖的汉文印章。

明代，在罗婺部范围内，彝文属于官方使用的文字之一。明嘉靖初年，土官凤朝明死后，其子凤昭奉母亲瞿氏主府事。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，土舍凤朝文（凤昭之叔）响应寻甸土舍安铨，拥后作乱，适逢凤昭母子均在省城。凤朝文在攻陷禄劝、武定之后，以“瞿氏母子已被戮、朝廷将进剿武定”的谎言，煽动彝族民众投其叛军，并与安铨连兵2万，围攻昆明。云南当局在外无援兵、“诸大吏缩项城内、无能画一计”的无奈之际，只得让瞿氏母子“亲写夷书”（彝文告示），四处张贴，被裹挟投军的受骗彝众看到彝文告示，便纷纷撤退，昆明之围始解。凤昭母子率众回到武定，彝众“咸投凤诏降”。凤昭母子也因此被列为平凤朝文之乱的首功。此事在《凤氏本末》等史志和禄劝镌字岩石刻的“凤公氏系”（又称“凤昭碑”）中，均有记载。

楚雄州虽是全国彝文典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，但对彝文典籍的收集和翻译出版工作，却始于汉族学者。1914年（民国3年）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云南往四川，途经武定县的环州村时，彝族土

司李自孔的夫人那兰芳送给他一本彝文《占吉凶书》，“书是先用硃墨写在草纸上的，以后硃字上又盖了一层黑墨”。此彝文书由丁文江携至贵州，经大定（今大方）县彝文经师罗文笔翻译，订名为《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》，收入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爨文丛刻》中。

1943年（民国32年）春，有马学良先生，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，到云南武定彝区调查彝族语言文字，住入茂莲（今万德）那氏彝族土司衙署。正月十八日傍晚，在土署中召开有来自附近数县毕摩20余人、民众数百人的毕摩大会。自此，马学良在土署收集、翻译和整理彝文典籍，兼作彝族礼俗调查研究，至同年十二月初一日返回昆明时，从土署带走彝文书籍2100余册，彝文典籍《劝善经》木刻雕版52块。马学良在云南彝区调查研究和彝族文献翻译的成果，先后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前的《边政公论》、《西南边疆》、《边疆从文》等刊物，于1983年集为《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》一书，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；所带走的彝文书籍，现多藏于北京图书馆、台北图书馆以及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等大学的图书馆，少数流散到日、美、英、法、澳大利亚等国；带走的木刻雕版则不知所终。

散落于民间的彝文书籍，则在历次社会战乱、社会动荡及“文革”浩劫中，难逃厄运。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，对彝文的禁锢才得以解除。1982年3月30日，州人民政府发出《关于彝文文献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，规定了抢救和保护彝文的具体措施，并成立了彝族文化研究室（1984年升格为所），开展收集、整理和翻译彝文古

籍的工作。至 1990 年，该所已收集到彝文书籍 900 余部，并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初步翻译。楚雄州档案馆、州民委、州博物馆以及武定、双柏、禄丰等县有关部门亦收集到一批彝书。尚有一些彝文古籍散存于民间。

楚雄州的彝文书籍，从内容上可分祭祀、占卜、律历、谱牒、历史、文艺、医药、伦理、神话、哲学、译著、契约等 12 类，多数典籍又每部含若干个类的内容。

2004 年 9 月 15 日，楚雄州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整理出版“彝族毕摩经全集”领导小组和顾问委员会，同时聘请省内和四川、贵州、广西等地彝族专家学者参与，拟出版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100 卷，拨给工作及出版经费预算 1 000 万元，整理出版工作按 3 年规划、4 年实施的原则进行，力争在 2007 年写成出版任务。所谓“彝族毕摩经典”，亦即彝文典籍。2008 年 11 月 22 日，已有 30 卷先期编译的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，并在楚雄州会务中心举行首发式；2010 年 8 月，又有 40 卷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。